

论苏轼对白居易“闲适”人生观的受容*

毛妍君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西安 710128)

摘要:北宋文人对白居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十分欣赏,白居易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让北宋中后期的文人都能从白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灵的归依。苏轼接受了白居易的“闲适”人生观,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深入思考,探寻内心的自适平和,并将这种思考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从而在困境中能够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从而以达观超越的人生态度笑看人生。

关键词:苏轼;白居易;闲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0)03-0171-05

白居易从少年时期开始写作,一直到七十五岁(会昌六年)去世,创作绵延了六十年之久,无论是他早年创作的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还是以《长恨歌》、《琵琶行》为代表的感伤诗,以及大量的闲适诗作,对于后世文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的闲适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1]这是由于在封建社会里,士大夫阶层的遭际大都同白居易的命运相似,总是“得意”时少,而失意时多。所以表现其“独善之义”的闲适诗特别容易被理解,被仿效,尤其是北宋文人,受白居易闲适诗的影响更是巨大。作为中国封建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北宋时期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时代的享乐之风提供了前提条件。真宗朝开始明确提倡享乐豪奢的社会风气,享乐之风弥漫朝野。白居易闲适诗中流露出的恬淡安乐旨趣适得其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北宋文人。虽然北宋中期随着诗文革新运动的兴起,杜诗成为文人的新选择,但是白诗并没有被淡忘。北宋文人对白居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十分欣赏,白居易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让北宋

中后期的文人都能从白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灵的归依。生活悠闲、俸禄丰厚的文人过着闲适享乐的生活,与白居易诗中所描绘的闲适人生颇有相似之处,故而心有戚戚焉;当他们仕途受挫时,又总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白居易,效法白居易闲适的人生态度。对白居易的倾慕是宋代士大夫的普遍风尚,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梅尧臣、韩琦、蔡襄等名人都写过效法白居易流连光景、赋性旷达的诗篇,其中受白居易影响最大、最著名的诗人就是苏轼,如南宋罗大经所言:“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2]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是一个罕见的奇才,同时,他又是遭遇磨难最多、生活起伏最大的作家之一。苏轼置身于波诡云谲的宦途之中,面临朋党的残酷角逐。他一生跌宕起伏,经历了数次大的政治变故。自嘉祐初26岁入仕到65岁终老,凡40年,苏轼的官职变动达20余次,其中任京官时间加起来不足7年,实任地方官22年,尤其是自58岁始谪居岭南惠州以至海南儋州7年,其晚景颠沛不遇。但就是在一生数起数落、坎坷异常的境遇之下,他却能在现实悲剧状态中始终拥有一种精神的自慰和超越,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深入思考,探寻内心

*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K017);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07XWA07)

的自适平和,并将这种思考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以达观超越的人生态度笑看人生、面对世界。这种在困境中能够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与白居易颇有相似之处,因此他更能在白诗中找到自我所需的精神食粮。笔者从以下几点着重谈谈苏轼对白居易闲适人生观的受容。

一、“似出复似处”的仕隐观。

宋朝拥有一支庞大的在职而赋闲的官僚阶层,这为士人淡泊名利创造了客观条件。相当多的士大夫对功名利禄都不甚热衷,与官场也保持了适度的疏离;而为官时做好隐居的思想准备,也成为士大夫们的共识。加之宋最高统治者为防止“大臣之持权……行不测之威福”,而使“进之退之,席不暇暖,而复摇荡其且前且却之心,志未申,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致使他们“浮沉于一日之荣宠”,既便“欲有为者,亦操不能久待之心”^[3]。种种原因都促使士人虽采取了身在仕途而心在草野,远离流俗又不遁迹山林的策略,对于政治的穷通与经济的约丰,采取不偏不倚的中庸态度,在大隐与小隐、冷落与喧嚣之间,选择了一条“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将做官当作隐居的道路。

白居易是“中隐”观念的发明者,他的《中隐》诗中,把“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的中隐生活描绘得十分安闲惬意。“白居易的人生实践也启示了后来的士人,在权利高度集中、专制进一步强化的庶族地主政治文化环境下,人生的基本‘程序’和内容以及所能够达到的‘最佳状态’,因而具有示范性的意义。”^[4]白居易这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非常契合宋代士大夫所面临的时势,宋人对白居易这种高超的“处世艺术”每加叹赏,甚至称他为“一代之伟人”。^[5]白居易进退裕如的生活态度和悠游闲适的生活也广为北宋士大夫所效仿。

苏轼就是学习白居易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轼一生处于新旧党争的矛盾夹缝之中,屡遭贬谪,但多年的流放并没有摧垮他,反而加深了他对人生命运的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吸收融合,在白居易“中隐”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不以谪为患、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处世态度,构建了可仕可隐的为官方针。不过苏轼性格上“稍

露锋芒,不及太傅(白居易)混然无迹”^[6],故一生挫折较白居易多。绍圣四年(1097),苏轼在惠州写了《纵笔》诗云:“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7]^[208]据说当时宰相章惇看见了此诗,认为苏轼在惠州太舒适,又把他贬到更远的儋州。其实这主要源于苏轼善于治苦遣怀,所以始终能以超然的态度看待官场升沉穷达。

与白居易相比,苏轼克服了白居易未能完全忘情于仕宦的庸俗的一面,从而做到了身在官场,却不以利禄萦心,更为超然洒脱。苏轼认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用时无需大喜,贬时也无需大悲。他在诗中说“未成小隐成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不做太白梦日边,还同乐天赋池上”(《池上二首》其二)、“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作此诗示之》),处处表现出恬淡悠闲的心境。张惠民也说:“苏轼极为超然,他能超脱贫富得失祸福荣辱等一切世俗功利观念对人心灵的束缚,用他的话说:‘了无丝发挂心,置之不复足道也。’又说‘还从世俗去,永与世俗忘’、‘绝弃世故,身心俱安’。意在抛开世俗之纷扰,获得一种心灵的宁静高远,以此为最大的快乐与理想之境界。他对所谓生死离别之‘人之常情’也多能超然待之。”^[8]可以说,苏轼将白居易付诸实践的“中隐”文化心态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从而达到中国封建士人“贬谪心态的最高层次”。^[9]白居易通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影响了苏轼人生态度的方向,苏轼从内在精神、襟怀风致上学习白居易,藉白居易的“闲适”人生观为自己寻求解决穷愁困境的一剂良方,那么,他的学白在本质上也必然融汇了自己特有的人生体验、情感追求和生活哲思,必然继承了有宋一代发展而来的独特精神。

二、乐观知足的心态

众所周知,苏轼一生曾一再表示对白居易的倾慕之情,周必大说:“本朝苏文忠公(轼),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10]苏轼也常大谈自己与白居易的相似,这类话语“屡形诗篇”。^[11]在黄州时,苏轼就称自己“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是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自注云:“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

诰,遂拜中书舍人。轼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17]424}苏轼认为自己和白居易的遭遇有相似之处,他欣赏白居易诗中的人生态度,他从白居易身上找到了解除人生痛苦的思考模式,从而能够遂缘自适、乐天知命,他说“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赠善相程杰》)、“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李道士》)等。他还经常自比白乐天:

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其序曰:“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作三绝句》)

与苏轼甚熟的王直方早注意到苏轼对白居易的推尊,他说:“东坡平日最爱乐天之为人。”^[14]洪迈则称东坡之所以慕乐天,盖因其自觉与乐天“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则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12]474-475}他认为“东坡”之名取意自白居易忠州刺史任上《东坡种花》、《步东坡》等诗,“白乐天谪忠州,州有东坡,屡作诗以言之,故公在黄州亦作东坡,用乐天之遗义也。”^[13]诚然,白居易《东坡种花》诸诗表现的是诗人恬静优雅的生活情趣和恬淡冲和的心境,苏轼也正是喜爱白居易这种处世态度,并且更为自觉地从白居易身上汲取身处忧患而泰然自适的精神力量。

苏轼的《醉白堂记》更清楚地写出他对白居易的认同:

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田园之乐,府有余帛,廩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此乐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方其寓形于醉也,齐得衰,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14]344}

苏轼以钦慕的口吻描绘了白居易令人艳羡的闲适生活:山水田园、赋诗饮酒的生活享受、恬然委顺、超脱旷达的乐易精神。由以上例子可知,苏轼对白居易的关注主要并不在于其诗语言的浅切通俗,而在于其安时处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白居易的“聪明”之处,松浦友久说的非常精辟:“白居易生存方式的标尺之一,就是把自己能决定的事——由己者,和自己不能决定的事——不由己者,明确地分开来,对于后者则托付给命运,对于前者,则积极努力去争取。”^[15]对于天地大道、生死大关,白居易是通晓其理并彻底领悟的,在此基础上树立了通达的人生观念,他说:“苦乐心由我,穷通命任他”(《问皇甫十》)、“穷通谅在天,忧喜即由己”(《把酒》),历经坎坷,终于摆脱重压,获得精神的解脱,从而随缘任运,即安即止。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后所过的那种“日与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田园之乐”,再加上“府有余帛,廩有余粟”富裕的物质生活,“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在封建文人心头的一个‘两难’问题——即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既保持精神上的超脱,又充分享受人生乐趣”,^[4]为苏轼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范式,这就是苏轼“景仰白公,可谓至矣”的原因,而且苏轼确实也达到白居易的境界,甚至更胜一筹。

苏轼在《谪居三适》三首中集中表达了自己对“适”的理解,诗中说:其一适乃“旦起理发”,那栉节疏朗的梳子含着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其三适是“夜卧濯脚”,临睡前洗足可代药疗病,最意味的是二适,“午窗坐睡”:^{[17]241}“蒲团盘两膝,竹几阁两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苏轼认为居官之时不能睡懒觉,头未梳好便已戴上沉重的冠巾,像服辕马一样风尘跋涉,纵然富贵,却似笼中之鸟,废放之时,心空意静,无去取之择、美恶之辨,尽可以晨起理发,从容梳理;午窗坐睡,清梦沉酣;月夜煮茶,任情随性。这种无拘无束、自得其乐的生活实在是朝为官者难以领略的。诗歌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官场的羁束和闲居的自由,与白居易《即事重题》:“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的情调何其相似!

据《容斋随笔》载:黄州教授朱载上诗云:“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东坡公见之,称赏再三,辄为知己。”^{[12]763-764}由此可见苏轼对这种“闲”

中情趣的欣赏态度,虽然有些不得已的味道,他还是“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苏轼也写了很多诗类似白居易闲适诗,有对于日常生活“闲适”的描绘,如“居官不任事,萧散羨长卿”、“闲里有真趣”、“洗足关门听雨眠……夜寒应耸作诗肩”等等。清人马位注意到“东坡诗融化乐天语及用乐天事甚多”,^[16]例如苏轼《次韵答邦子由五首》中“引睡文书信手翻”化用白诗《晚亭逐凉》“引睡卧看书”;苏诗“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记几回来”(《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化用白诗《留题天竺灵隐两寺》“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的形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三、家常适乐的艺术人生

白居易从不讳言自己的平凡与世俗,特别是到了晚年,白居易更是悠闲、细致地品味着养老生活,他总是十分坦率地在诗中描绘有关吃、喝、穿、住的细碎情节,表现出日常生活的沉醉,体现出乐天知命的豁达和适乐情味,正因为如此他在宋人心目中才显得并非高不可攀而是特别亲切,苏轼也是如此。张惠民说“(苏轼)极超然脱俗,又极寻常入俗……苏轼又是一个极寻常入俗的人。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常人生活始终怀有一份亲和感。”^[18]苏轼在黄州写信给李常时说:“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14][49]}在“劳苦”生活中,他竟然以有屋、有果菜、有桑等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物为“乐事”!因为他热爱生活,拥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雪剑严相逼”的艰难岁月中,苏轼仍能体会到生活的甘美,处处发现美好的事物,因此他总能保持乐观的心态,笑对人生,也就拥有了“善于发现美的眼睛”,那世间还有什么痛苦不能超越呢?

苏轼很会享受生活,在宦谪生涯中,他有“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欣慰,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喜悦,有“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的洒脱,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潇洒。苏轼总是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乐趣,给枯燥、甚至是艰苦的人生增添几分亮色: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

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幸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苏轼的文集的排列就饶有趣味,前面是《观音菩萨颂》之类,后面就是《东坡羹颂》、《猪肉颂》之类。即使在艰难的贬谪时期,苏轼仍然苦中作乐,如《与子由弟十首》之七:

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曷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诀别,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白黍,没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文遗之,虽戏语,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14][1837]}

读后让人忍俊不禁,文中没有一点感伤。生活本身即是精神丰厚修美的体验,苏轼是善于诗化人生的行家里手,哪怕生活沉重、命运多舛,他尽可能地享受生活、善待今生,他都保持着昂然的热情和高雅的情趣。在儋州,还留下了东坡酒、东坡肉、东坡帽、东坡扇、东坡茶等美谈。在惠州,苏轼自酿酒招人同饮,“捣香筛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带雨浑。收拾小山藏社瓮,招呼明月到芳樽。”(《新酿桂酒》)显得是那么兴致勃勃。苏轼的超脱精神,不是游离世外,逃避现实生活,而是从比常人更高的境界去看待生活中的困难,进而克服之;苏轼以人生哲理的眼光来审视人生,采取了达观的人生态度,用艺术化的方法处理人生,尽量发现、体悟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达到对悲哀的扬弃。因此,他的超脱中蕴含着丰厚的求实内容。正是这种超脱的人生态度,支持着苏轼大起大落的人生,使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执着与热情。

白居易的闲适诗中已经开始大量取材日常生活入诗,这种风气到了宋代士大夫手中发扬光大,开始大规模、深入地透过对日常生活的情趣发掘与用心享受,从而形成了自我独特的品味。苏轼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白居易闲适诗的影响,他的诗取材延伸到生活的每个间隙,不甚醒目的生活场景、居处空间等琐细题材,把诸多普遍的生活经验,如穿着饮食、闲行坐卧、赏花植树、游山玩水、参禅学道、睡眠、赠茶、惠墨等内容也写

入诗中,都蕴含了他的好奇与思考。其实,不只是苏轼,宋人或多或少也都具有这样的超然情怀,善于对现实人生进行情趣化和艺术化的精神加工和审美处理,使得游山玩水、建造园林、读书作画、养花种竹、饮酒品茗等普通的生活场景焕发出无尽的高情雅趣,这同样与白居易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56.
- [2]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乐天对酒诗”条,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346.
- [3]王夫之.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4]张再林.“渊明吾所师”与“出处依稀似乐天”——论苏轼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接受[J].贵州文史丛刊,2004,(4).
- [5]王得臣《麈史》卷中《贤德》云:“牛李之党,唐之名卿、才士大夫孰非其徒。独退之卓然无所附丽,乐天以高退不近祸。二公各行其所学,可谓一代之伟人”,宋元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333.
- [6]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

1959:276.

- [7]冯应榴辑.苏轼诗集合注卷(三十九)[M].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8]张惠民.简论苏轼的文化人格[J].汕头大学学报,2003,(5):58.
- [9]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638.
- [10]周必大.二老堂诗话[M].见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656.
- [11]王直方.王直方诗话[M].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45.
- [12]洪迈.容斋随笔(卷五)[M].“东坡慕乐天”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3]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卷二二二)[M].清康熙三十八年苏州步月楼刻本.
- [14]孔凡礼.苏轼文集(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5]松浦友久.论白居易诗中“适”的意义——以诗话史的独立性为基础[J].李宁琪译.山西师大学报,1997,(1):46.
- [16]马位.秋窗随笔[M].见王夫之等《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827.

(责任编辑 岳毅平)

(上接第156页)往往是由于公共安全事件的侵害而引起的社会公众共性的心理感受和反应,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共性的行为反应。公共安全事件所带来的不安全感往往会引发社会局部的或全局的动荡和冲突,进而影响社会和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一方面应根据社会公众的工作、生活状况及存在的身心健康问题和情绪压力问题,综合运用心理学、医学和管理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提供团队工作、人际交往、家庭和个人生活方面的诊断和咨询。另一方面,广泛传播心理危机干预的知识,包括自我疏解、自我治疗、互相援助的知识与技巧。

参考文献:

- [1][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2.
- [2]徐家良.政府评价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3][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第三版).许

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4]Maslow,A.H.A clinically derived test for measuring psychological security-insecurity.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1945,(3):21.
- [5]许又新.神经症[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105-214.
- [6]方奕哈.老师家长能为受地震惊吓的孩子做什么[N].中国青年报,2008-05-15(12).
- [7]龚益.官民“信息不对称”:公共参与的瓶颈[J].人民论坛,2008,(14):34.
- [8][美]马克·E·沃伦编.民主与信任[M].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29.
- [9]张维平.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的建构[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6,(3):32.
- [10]胡平,李凌已.来自白色春天的预警——从非典危机看建立国家心理预警与应急支撑体系的必要性[J].科技与企业,2003,(6):35.

(责任编辑 焦德武)